

#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摘要

沈大伟 (David L. Shambaugh)：《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 目录

### 第一章：导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省期——探寻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双重状态

本书的结构

### 第二章：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演变

垮台的原因

### 第三章：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悲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者

中间立场？

### 第四章：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风暴之后：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

对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崩溃的解释

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地的崩溃

所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般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发展应该吸取的具体经验教训

幸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朝鲜、越南和古巴

朝鲜

越南

古巴

到处撒网

### 第五章：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颜色革命”

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

兼收并蓄

## 第六章：重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之维

重塑意识形态

宣传部门：收缩中的调适

新意识形态

“三个代表”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中国特色的民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从理论到实践

## 第七章：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之维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加强党的建设

反腐败与严肃党纪

重建地方党组织

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

加强党内民主

提高干部的能力

中期培训

党校系统

干部学院

中央党校

领导集体的更替

新生代领导人

五年来的胡温领导集体

## 第八章：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存在吗？

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适：资产负债表

预测未来

汉学家们的预测

笔者的观点

# 第一章：导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

本书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建制（institution）的中国共产党。

##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省期——探寻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

当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纷纷下台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从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失败和其他执政党体制（包括现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党威权主义国家、多党制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中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自身的现状？如何把这种自我认识与对其他政治体制的研究相结合？198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维持执政地位？这些正是本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前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事件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但是它在党内改革和国内改革上却非常积极主动。这些改革涉及面广，目标集中，都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双重状态

**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

当然，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改革是否足以使其永葆执政地位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本书的结论是：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动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消极被动，又积极主动，只能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自19世纪70年代“自强运动”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一种“拿来主义”文化，即从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合适的模式和思想，引进并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茎上，创造出一种“兼收并蓄型国家”。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成为混合政党。

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各种严峻挑战，许多既是体制性的挑战，也是其执政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做得相当不错，但不能保证以后也会成功。

## 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依次阐述上文提出的观点。由于本书显然想从比较的视野来考察中国共产党，因此第二章概述了西方专家们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所面临并最终导致其垮台的共同问题所作的研究。第三章评价了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现状。第四章转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崩溃原因的内部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和那些幸存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应该吸取的教训。

第五章简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亚洲、中东、欧洲和拉丁美洲其他政党-国家的分析。这种比较为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原因和性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第六章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内部研究和新思想，它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改革提供了理论原则。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领域的许多改革，它对自身的缺点和所面临的挑战的评估，以及解决这些缺点和挑战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行动计划。最后，第八章对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和长期执政潜力作出了总体评估。

## **第二章：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

如果说对苏东剧变的反思性研究文献存在一个核心思路的话，那就是对于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来说，不存在任何单一的“灭亡”之路，即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导致这些政权垮台的“路径依赖”。

### **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演变**

研究共产主义体制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有关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似乎都经历过的各时期的“阶段理论”。大多数比较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政党经历了从重视意识形态和社会转变的初级阶段（经常利用典型的“极权主义”的恐吓和宣传方式）进入到重视技术理性和效率的指导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它涉及使用官僚政治管理的“更加软性的”“威权主义”方法）。

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注意到，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演变超出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学者所描述的极权主义官僚政治阶段。从政治上说，这一转变说明了从极权主义政权向威权主义政权的转变。

### **垮台的原因**

#### 1. 经济变量

- 指令经济的问题，
- 服从于军事而对经济的扭曲，
- 改革的结果，
- 国际因素。

#### 2. 政治变量

- 来自上层的改革，
- 来自下层的改革，
- 党的控制力随着时间而遭到腐蚀（认知领域、安全领域、党组织、政府部门）。

### 3. 社会变量

- 公民社会的兴起，
- 组织化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e）程度的降低，
- 经济变革的社会影响。

### 4. 文化因素

- 对社会主义的疏离，
- 信息的全球化，
- 正在变化的身份认同。

### 5. 强制力变量

- 极权主义控制力的下降，
- 职业军人的出现。

### 6. 国际变量

- 戈尔巴乔夫的影响，
- 日益独立的东欧，
- 对国外政治制度更深入的认识。

表 2.1 西方关于共产主义力量崩溃的要素和原因的评论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	强力因素	国际因素
经济停滞	作为个人领袖的戈尔巴乔夫	半自治的或自治的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的兴起	道德真空以及公众对于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玩世不恭	“党军”(party-army)的削弱——职业军人的兴起	“帝国的过度扩张”（苏联）
消费者被剥夺	苏联的“新思维”(glasnost)	与工作场所和国家的疏离	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疏远以及重写历史——寻找过去	准军事部门和治安部门对于执政党的忠诚度不可靠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失败（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
军事上的过度开支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开支的扭曲	自治的工会的形成（波兰）	不断增加的腐败	越来越不顺从的媒体	强力机构的腐败	东德和西德之间的东方政策

(续表)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	强力因素	国际因素
“第二经济” (second economy) 和黑市	改革精英与 公民社会之 间的联系	劳动流动 性和其他 可选择的 就业机会 的增加	全球化对 大众文化 的影响	大众恐吓 和胁迫手 段的使用 减少	东欧国家 的外交政 策日益独 立于莫斯 科
与国际贸易和 金融体系的 隔离	马列主义意 识形态的去 合法性	同侪监视 (peer moni- toring) 和 监督的减少	道德激励 的吸引力 下降	对人权议 题敏感度 增加(后 赫尔辛基 协定)	从外部 (苏联) 强制建立 的政党— 国家
很少接受外国 直接投资(或 者说作为变革 代理人的外国 直接投资)	官员的腐败 和党的特权	(遭到挫败 的)对出 国旅游的 渴望— 一旦接触 外部世界, 比较不可 避免	族群紧张 关系以及 追求族群 自治的地 区/国家	全球化	
某些国家的通 货膨胀	党在其等级 制度内部实 施纪律的能 力下降	企业中政 治忠诚与 切实的奖 励之间相 脱离(正 在衰落 的新传统 依附结构)	日益增强 的民族主 义身份认 同(不同 于社会主 义的身份 认同)		

(续表)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	强力因素	国际因素
不可兑换的货币	新的政治精英在党组织之外的地方一级的出现以及(各级)干部在“新经济”中获得既定利益	劳资关系日益紧张	宗教吸引力的增加以及天主教会的作用		
银行部门破产和债务积压(“三角债”)	官僚机构的反应迟钝和低效	断断续续发生的社会抗议、罢工和怠工			
落后的农业以及较小规模生产或者个人生产的兴起	当权者政令的减少	非法“征税”、征员和收费			
中央计划的低效	尽管转向了“专家政治”，但是在新的经济气候下，有越来越多不胜任和没有能力的干部和官员在政治精英层担任职务	旨在建立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的压力形成			

(续表)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	强力因素	国际因素
党对计划的干预	工作单位中基层党组织的腐蚀和消失				
市场机制的落后和停滞	对党中央和政府指令的不服从或者阳奉阴违				
价格扭曲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下降				
补贴和“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					
国家对于财产权的垄断遭到腐蚀——经济改革之后,个人实际上已经开始掌握土地和企业的所有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的收益很少,但地方政府因为预算外收益而降低了对上级分配的依赖					

(续表)

经济因素	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	强力因素	国际因素
政府预算赤字增加					
苏联的“新思维” (perestroika) 以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改革					
一旦经济改革开始, 就无后路可退, 因为地方干部和被授权的公民获得了新的既定利益 (新形式的“路径依赖”)					
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部门 (以及军队) 所能找到的新的收益来源, 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寻租行为的增加					

### 第三章：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中国观察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他们之间有两个明显的分裂。

第一个分裂是那些关注中国表面形态——它的经济能力、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外交政策——与那些研究中国国内状况的学者之间的分裂。前一阵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有凝聚力、日益强大的国家，它的影响和力量正在扩展到世界舞台。

第二个明显的分裂是在那些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状况的分析家当中产生。一个值得指出的有趣现象是，这种分裂出自这些分析家圈子的一个重要共识：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受着多重问题和脆弱性的折磨，他们一致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党的合法性降低，党的组织遭受腐蚀，官方指令越来越得不到服从，党的意识形态空洞化，社会道德出现真空，腐败无法遏制，官员热衷于寻租和其他掠夺性的寄生，等等。

因此，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收缩之中。但是，对收缩发生的范围和程度，学者之间有很大分歧；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改革尝试在重建党的合法性、支撑党的治理方面是否成功的问题上，双方的不同意见则更加尖锐。其中一方（“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极其严重，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都是无效的。而另一方（“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本质上是可以解决的。

## 悲观主义者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谢淑丽和鲍瑞嘉（Richard Baum）这三位知名中国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屈指可数。在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激烈批评中，裴敏欣是典型代表。但裴敏欣的预测并不是政权会垮台，而是长期停滞，因为它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章家敦和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分别预测到政权崩溃与民主突破。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和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也持类似观点。威尔·赫顿（Will Hutton）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描绘为结构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列宁主义的法团主义”。郑永年认为，制度的变革既是必要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 乐观主义者

杨大力探讨了不同的经济改革促进了不同的治理改革，从而加强了政党-国家。李成探讨代际变化、领导更替的积极效果，以及胡温政府进步的社会政策。我所编辑的一部名为“中国不稳定吗？”的书中，论文作者们总结道，即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问题的迹象，政权也不一定就必然处在崩溃的危险当中：中国处在一种“稳定的不安宁”状态中。朱云汉认为，胡锦涛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蒋经国治下的国民党之间出现了相当多的政治趋同性。傅士卓（Joseph Fewsmith）、黎安友、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等学者和我都认为，中国列宁主义的制度依然强大，而且它正在进行“重新制度化”。鲍瑞嘉关于中国共产党重新制度化的评价表示有所保留，他认为，胡锦涛引入党内的协商机制，在党处理社会问题时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布鲁斯·迪克逊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前者不会走后者民主化道路。蔡欣怡（Kellee S. Tsai）同意迪克逊的结论，认为私营企业家和新型中产阶级并不会要求制度变革。墨宁（Melanie Manion）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另一项创新：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爱丽

丝·米勒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生活规则和规范的稳步“制度化”。黎安友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化”：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不过，他也认为这个政权仍然面临着大量关系其生死存亡的挑战。

## 中间立场？

我想提醒悲观主义者，衰退是一种**逐步**的状态，是经过长时间才会达到危机的状态。因此，要把中国共产党控制力的收缩界定为一个缓慢的衰落过程，而不是如苏联、东欧和蒙古那样是一个零和爆裂过程。

当今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未知领域。它同时处在**收缩与调适**的状态中。调适可以使收缩过程保持稳定，甚至可以使收缩过程发生逆转。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近些年一直处在逐步的衰退中，但是自1978年后它一直在进行调整和适应（包括1989-1992的中断）。在这段时期，为了延缓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它采取了各种保护性措施——压制，适应，吸收，允许多元趋势，但是，所有措施都只是**策略**而已，是用来应对那些本质上固有的、系统的、积习成癖的状况的。

## 第四章：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自我“重造”、拯救和再合法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想理解这些改革，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下列事件的评判：（1）1989年春的“天安门”事件；（2）1989-1991年东欧和苏联的事件；（3）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4）亚洲、中东、欧洲和拉美各类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要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采取（和不采取）的改革及其原因，它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和对那些政治制度的评判是绝对的关键。

## 风暴之后：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

在镇压之后，中国的领导人立即把这次事件归因于国内外的许多因素。领导人的讲话强调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颠覆图谋和影响。江泽民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解释，把青年人的反常思想归因为思想宣传工作的失误。

## 对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崩溃的解释

当时的评论仅仅归因为一个因素：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东欧的暴乱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出任何具体的指示文件，规定解释东欧事件的“方针”。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发表解释东欧剧变原因的各类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主办的杂志上。这家研究所在分析和判断苏联解体原因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有一篇文章强调了后来在许多分析中反复出现的4个原因：

1. 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债务猛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 专政，执政党脱离群众，缺乏基层党建；
3. 工会没有成为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桥梁；
4. 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中国对东欧剧变的事后分析往往不思考西方学者所重视的各种过程、力量和原因（第二章）。没有公开和已发表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学者思考了公民社会、“天鹅绒革命”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更不用说思考匈牙利等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向反对派赋权的压力、军民关系的性质和对安全机构的控制、“赫尔辛基进程”以及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了，或者由此思考戈尔巴乔夫为东欧示威者所开的绿灯：苏联不会干涉东欧国家的示威活动。中国的学者也没有真正分析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它们的历史环境，以及它们掌权道路的不同。他们往往从总体上分析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把它们视为一个群体，因而他们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这或许表明，当时中国对东欧局势的情报搜集和认识工作实际上做得相当差。另一种解释是，中国的学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东欧的局势，但不被鼓励进行这样的讨论，以便不在中国公开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东欧剧变的事后分析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深刻。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崩溃的原因进行了逐国的分析。

按照这项研究，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原因：外债猛增，通胀高企，工业发展失衡，价格不反映供需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所有这些经济条件，加上“赫尔辛基进程”带来的人权压力，激起了对独立工会的要求，推动了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成立。

然而，匈牙利剧变的根源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原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派别林立，但它还决定接受企业家阶层（经济改革的结果）入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新思维”也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精英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东德的失败被认为是经济因素（过于坚持计划经济）和政治因素（领导人和政党的僵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据说经历了知识分子推动的“来自下层的改革”。在罗马尼亚，政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失去了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控制。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观点，保加利亚的失败不过是一种“多米诺效应”。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些学者看到了不同个案中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和民主化；（2）普通公民的不满，这种不满被反对势力利用；（3）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简而言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简要地总结说，苏东国家的剧变正是“社会上的反对派、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三股政治势力联合起来”的结果。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认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失败的原因是它们接受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思想。据说，这些政权是“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模式”的翻版——一位作者称之为“共产法西斯主义”。

越来越多样和大胆的研究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和对“左倾思想”的公开批评之后。

## 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地的崩溃

西方许多学者的分析往往只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行为和失误。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广阔。中国学者的分析强调苏联共产党机构的弱点，而且苏联的政策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中国的评析还指出了许多其他的诱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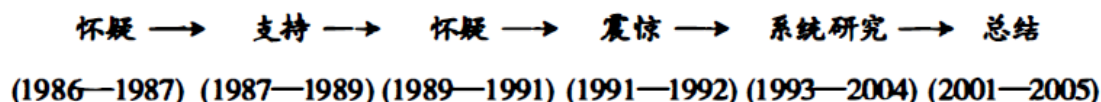


图 4.1 中国对苏联改革和解体的分析

中国学者对苏联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分析并不是抽象的研究，而是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

高狄对苏联政变失败和苏共亡党的分析，以及所总结的教训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党内多年来的进一步分析。高狄指出了苏联政变及其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和苏联衰亡的一些原因。他首先指责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的错误。第二，苏联的政变者没有对反政变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还认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苏联“8·19事件”的原因之一。

后来，中国学者开始更深入地探寻苏联解体的诱因，寻找造成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他们发现，事实上，苏联解体的根源并不是在1991年8月达到高潮的“完美风暴”，而是苏联的长期衰落、管理失误、判断和政策错误、制度的扭曲、缺乏应对失败和创新的能力、过度的教条主义、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不适当的外交政策，以及各种其他的弊端。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对**制度原因**的强调与西方学者的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强调**直接的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和1990-1991年的直接诱导性事件。

虽然中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批评具有制度和全面的性质，但是这些批评可以分为四类：经济因素、政治和强制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国际因素。

表 4.1 中国学者认为造成苏联解体的因素

经济因素	政治和强制因素	社会和文化因素	国际因素
<p>经济的停滞</p> <p>过度集中的经济和运行不畅的市场机制</p> <p>集体化和大规模的国有农业</p> <p>与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隔绝</p> <p>党对政府经济机构的控制</p> <p>低税基</p> <p>高补贴造成价格的严重扭曲</p> <p>重工业过度发展，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p> <p>过度发展国防工业和军工部门</p> <p>国家对财产的垄断</p> <p>中央与地方之间几乎没有收入分享</p> <p>生产效率低下</p> <p>对资本主义的教条式意识形态偏见</p> <p>改革太小、太迟和太快。</p>	<p>“极权主义”的所有特征</p> <p>政治权力过度集中，个人专制</p> <p>系统地更新政治领导人的失败</p> <p>缺乏党内民主</p> <p>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p> <p>党对国家的控制</p> <p>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右倾”）的长期“左倾”倾向</p> <p>党享有社会特权，变成“统治阶级”</p> <p>官僚机构效率低下</p> <p>干部职务委任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过于庞大的官僚体系</p> <p>党员纪律监督机制过于薄弱</p> <p>对党的领导人的“信任危机”</p> <p>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p> <p>在经济基础准备好之前开始政治改革（新思维）</p> <p>最高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地位的弱化，造成国家失去对党的制衡</p> <p>虚假的联邦制——对其他加盟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支配</p> <p>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成功，推翻苏联政权</p> <p>戈尔巴乔夫推行苏共的民主化（太大，太迟），试图将其改造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p>	<p>以极权主义恐怖恐吓人民群众</p> <p>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p> <p>社会在所有方面与外部世界隔绝</p> <p>工人与党—国家之间的疏离</p> <p>工人效率低下，缺乏激励，产品质量低劣，生产下滑，工作场所不稳定</p> <p>普遍存在的酗酒现象</p> <p>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沙文主义，包括民族清洗、强制劳动和少数民族强制迁移</p> <p>脱离苏联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兴起</p> <p>道德真空、公众的犬儒主义和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p> <p>迫害知识分子</p> <p>知识分子中的教条主义倾向</p> <p>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闻“多元化”</p> <p>苏联共产党与社会各个部门之间关系的瓦解</p> <p>青年人的理想幻灭</p>	<p>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p> <p>冷战遏制政策造成的经济压力</p> <p>冷战造成的军事压力</p> <p>扩张主义和霸权政策，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p> <p>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沙文主义</p> <p>对东欧和其他卫星国（古巴和越南）的支配</p>

# 所吸取的经验教训

## 一般经验教训

李静杰提出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八大教训：

1.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2. 思想不断解放和创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
3.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尤其是实行“开放”政策。
4. 不仅要考虑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5. 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
6. 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7. 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要确实保证各民族平等的权利，保证各民族能够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自主权；加快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但是，要认识到民族地区实行“政治多元化”的危险。
8. 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济改革不放，但是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

马书芳和李靖宇提出了中国应该吸取的四大经验教训：

1. 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 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正确对待过去的失误，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3.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加强宣传和思想工作；
4. 必须不断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维护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群知名专家提出了苏联解体的八大经验教训：

1. 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2. 不断改革和适应时代的变化；
3.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4. 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和民主的；
5. 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6. 必须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7. 处理好民族问题，加快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
8. 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不能急于求成，允许党内讨论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季正矩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兴衰成败中吸取的十大经验教训：

1. 在指导思想，要善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创新的精神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
2. 在组织和制度建设上，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
3. 在作风建设上，必须坚持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原则，坚决反对腐败现象和既得利益集团出现；
4. 在领导方式上，必须适应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不断改进和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5. 在适应生产力要求上，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强国富民为己任；
6. 必须高度重视并慎重稳妥地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
7. 必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放弃党对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的领导等于自毁长城；
8. 不能忽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
9. 要处理好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
10. 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得到人民拥护的外交政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总结提出了五个经验教训：

1.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但应该承认而不是忽视和否定这些错误；
2. 坚定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通过组织建设，加强对干部的思想宣传工作，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机制，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等等；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先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后进行政治改革（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
4. 重视民族统一，反对分裂主义；
5. 高度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战略，高度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

## **中国共产党发展应该吸取的具体经验教训**

黄苇町把注意力对准了腐败问题。贺秋刚还强调指出了党内的腐败问题，认为要尽快出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以接受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是另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

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是另一个应该吸取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走得太远，使党“听不到”社会的关切，允许恶意攻击政府和军队的权威，歪曲现实，为非党声音提供了喉舌，为西方对苏联新闻机构的渗透提供了直接的机会。

最后一个经验教训是如下结论：无论如何都不能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 幸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朝鲜、越南和古巴

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是，当其他许多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时候，这三个共产主义政权为什么能够幸存下来？

### 朝鲜

在中国对外国共产主义政权的评价中，朝鲜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范例。

### 越南

中国学者称赞说，越南和越南共产党经受住了苏联解体的风暴，推进了改革道路。

经济发展上：革新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国有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垄断；所有制结构改革。

政治发展上：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道德素质和生活作风，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加强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地方党委实行差额选举的实验。

### 古巴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项研究认为，古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是因为三个主要因素：党建与反美民族主义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平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位官员则认为是一系列其他的因素：选拔年轻干部；发展新党员；精简中央、省委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效率；领导人经常视察农村；制定和实施重大决策前在全国进行广泛的群众大讨论；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员的监督，贯彻反腐败措施；建立遍及所有学校的党支部。

毛相麟赞同上述评论的许多看法，但他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党内民主”、党和政府与社会各个部门的对话、对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控制，以及强大的民族主义。然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另一项研究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古巴共产党的成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本国思想（马蒂思想）相结合；拒绝西方的多党制；拒绝不适应本国国情的苏联模式；强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组织党员举行专门的学习研讨会；运用新闻媒体宣扬爱国主义；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建立党支部；建立干部必须会见群众并向群众“汇报”和实行民意调查的制度；允许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参与地方党委选举；不允许官员和党内高级干部拥有特权；对腐败官员实行“零容忍”政策；根据工作成绩提拔干部和严格审查提拔的干部；精简中央和各省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

## 到处撒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者还对非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 第五章：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 “颜色革命”

中国对颜色革命的研究包括六大重点领域。

1. “颜色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分析家们非常怀疑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2. 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的霸权地位；向全世界输出民主。
3. 非政府组织（NGOs）所扮演的角色。
4. 中亚其他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
5. “颜色革命”对俄罗斯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战略不利影响；赞许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政府开始调查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可能发挥的破坏性作用。
6. “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担心、担忧和偏执。

### 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

对新加坡的推崇：认为新加坡的民主是一种“指导性民主”（guided democracy），并且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归结为：（1）成功的政策；（2）同反对派的合作。发展党员和持续的政府官员在职培训也是人民行动党体制的力量之源。李文把人民行动党的成功归因为：（1）建立行政国家；（2）党政合一；（3）把某种西方文化作为“必要的恶”加以容忍，但不容许色情、批评政府、攻击领导人和政治颠覆。

蔡定剑更深入地研究了人民行动党的运作方式，发现民主在新加坡也发挥了作用，因而应该在中国发挥某种作用。

马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强大的爱国和道德教育、对政府财政政策的控制和反美论调。

日本自民党：与企业部门关系密切，拥有强大的农村基础，与政府官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中国学者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为以下几个因素：金钱政治（“黑金”）和腐败、党内的宗派分裂、低效的领导层、台湾本土认同的兴起、国民党与大陆人之间的传统联系以及李登辉的阴谋。

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党（Golkar）：苏哈托家族和统治集团的腐败；不宽容的政党意识形态（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对）、农村的贫困、国家地理的分散和统治的困难、党内的宗派斗争以及军队的不忠。

印度国大党：甘地家族对国大党权力的私人化、国大党对政府官僚的支配（党=国家=国会）、失去传统低种姓选民的支持、党内的宗派斗争、党内的腐败以及统一如此庞大和多元的国家的种种困难。

在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军队与执政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一党统治（即使不是公开的军人统治）的根源之一。军人干政在这些国家的衰落是它们民主化的关键原因。

叙利亚：强人总统（阿萨德及其儿子）、军队的强大政治地位（尽管由政党控制）、党对社会各个部门的渗透、群众组织的成立以及党对所有地方官员的控制。

墨西哥和革命制度党（执政长达71年）长期执政的原因：迎合墨西哥男性政治文化的强势总统制、革命制度党培养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 ability、革命制度党与农村的密切关系以及实施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经济政策。失效的原因：经济政策的错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追求、过于僵化的政党组织（不可能实施自我改革）、党内腐败、全球化的影响、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外部压力、美国对反对党的支持以及美国的外交压力。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法团主义制度。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制度。华清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六个方面：

1. 以康德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主义”；
2. 基督教教义；
3. 马克思主义；
4. 法国关于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主权和民主的思想；
5.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经济学，特别是国家刺激消费和投资的角色；
6. 有组织的工人。

对英国布莱尔的“新工党”和“第三条道路”等改革的考察。

比较欧洲政党和美国政党的差异（自下而上、党纲明确、纪律严格、队伍稳定 vs. 组织松散的“干部党”“选举党”）；欧洲和美国在世界观和外交政策上的差异（较为全面深刻的理性主义 vs. 较为简单肤浅的实用主义）。

## 兼收并蓄

在这些对其他政党-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广泛研究和由此汲取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学者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的特征。中国的政党-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演变成一种兼收并蓄的实体。

## 第六章：重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之维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至少自1989年以来是这样），并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僵化的列宁主义政权，最终会在不可避免的民主进程中垮掉。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总体性和成效证明了西方的这个普遍看法是错误的。同时，这些改革还证明了西方对中国的另一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来维护它的执政地位。这两者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两个关键来源，但二者远不足以解释其长期执政的能力。

### 重塑意识形态

倘若中国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只有三个选择：（1）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尝试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2）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3）修改和调整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符合非意识形态性的政策决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第三种选择。

自从1978年邓小平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以来，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在此之前，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演绎关系。从此以后，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为经验现实辩护的劝诱手段。

### 宣传部门：收缩中的调适

尽管各级宣传部门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日渐减弱，但是它们仍然能够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方进行审查。除了这些积极的控制机制，中共各级宣传部门还有一种消极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自我审查而不是直接的官僚干预。

虽然中国共产党各级宣传部门仍然具备相当强的控制和审查能力，但是它们由于技术现代化、社会多元化、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而失去了许多控制力，也由于公众的嘲讽和怀疑而正在失去影响力。

在宣传领域中，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日益加剧。商业化正在影响着国家对传媒的控制

## 新意识形态

### “三个代表”思想

1.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表明了政党哲学、政党构成和政党方针的一个重要甚至根本的转变：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党必须进一步把新兴的特别是私营企业中的工人阶级部分吸纳进来；更宽泛地看，江泽民也是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打算走东亚其他许多执政党的道路：成为一个包含商业精英的精英政党。

与江泽民强调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成员入党不同，胡锦涛自2002年上台以来就把“三个代表”的重点明显转向“第三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胡锦涛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是一种积极的构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大同”思想和现代的社会主义信条。然而，胡锦涛的构想也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

###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核心之一，或许是其**唯一**的核心。有两个因素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综合发展”。2004-2005年，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和胡锦涛本人开始具体阐述“科学发展观”，并在此过程中将这一思想转变成一种可以包含许多政策的理论体系（umbrella theory）。

## 中国特色的民主

2004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官员提出了各种关于民主的理念和提法。但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民主的许多论述主要是指体制内民主，也就是说，加强党内自由讨论和集体决策的准则和渠道。

一些人认为，民主的扩大是一个包含两个阶段的过程：先是党内民主，后是党外民主。俞可平的“增量民主”观响应了这种观点。李君如对民主讨论的主要贡献则是“协商民主”概念。

##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们将中国共产党从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和结论，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结构安排和内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存在惊人的相似。几乎所有的“经验教训”都写入了这份文件：

1. 政策重点放在经济、物质和社会发展上；
2. 关注意识形态，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适应中国国情；
3. 反腐败和加强党的纪律；
4. 领导干部实行轮岗制、退休制和更换制；
5. 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外协商；
6. 改革和加强基层党组织；
7. 提高干部能力素质和改进党员发展工作；
8. 反对西方颠覆和“和平演变”的图谋；
9. 关注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
10. 实行开放的外交政策，融入国际社会。

## 从理论到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机构和组织能力的一系列实践努力中，上述意识形态举措充当了理论基础。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在于它对社会的组织渗透和支配，因此，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建设的举措。

# 第七章：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之维

---

##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2004年12月底和2005年1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率先发动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在这些社论发表不久之后，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意见详细阐明了开展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标，特别集中于如下问题：强化各级党委，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败斗争。

这是一场旧式的“整风”运动，一种特别具有侵入性的政治运动，旨在拷问党员，使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处罚或清除那些不够格的党员。

## 加强党的建设

### 反腐败与严肃党纪

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全国各级纪委处罚了846760名违纪党员，其中137711人被开除党籍。

尽管中国共产党公开查处了这样一些腐败案件，但是腐败问题仍是体制性的痼疾。

### 重建地方党组织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一方面恢复和加强现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活力，另一方面在新出现的实体中建立新的党委和党支部。这一努力不仅是要强化地方党委，使它们对上级的命令更加负责，而且也要让地方党委对地方利益更加负责。这一努力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1）把握好党委领导的选拔；（2）加强“党内民主”；（3）重建地方党委自身。

### 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

这个思想主要是为了提高八大“民主党派”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

### 加强党内民主

1. 试行党委差额选举制度；
2. 党委应该听取公众的意见和批评；
3. 鼓励党内对政策的批评；
4. 提高决策透明度，增强责任感；
5. 提高党的决策对“民主党派”的批评的回应。

### 提高干部的能力

2005-2006年的保持“先进性”活动是考察每一位党员的一种系统性尝试。这场活动清除了大约4.5万名被认为不合格的党员，但是这场活动的总结阶段也明确指出了那些存在弱点并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党员。

加强培训一直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第二个主要方法。这一方法主要在全国各地的党校系统中实施。第三个方法是加强各级组织部对干部任命和提拔的审查和批准过程。

## 中期培训

这种“行政培训”主要是通过全国各地的干部管理学院和行政管理学院来完成，这些学院由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党校系统以及其他专门的职业培训项目共同管理。

## 党校系统

通过这一系统，中国共产党保持对4000多万名党政干部的控制。全国的党校系统是组织部人事管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党校系统，以及国家行政学院（针对国家干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的社会主义学院，通过多种多样的培训项目，履行如下几项重要职责：

1.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最新的政策文件；
2. 学习党的组织管理机制和方法；
3. 学习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
4. 学习基本知识，扩展视野，比如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国际关系和哲学。

## 干部学院

在党校系统中，另一个重要制度是三所新的“干部学院”。曾庆红创建这些学院的意图，是建立一条“干部生产线”。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着重革命历史、“国情”和内陆地区，而浦东干部学院着重体制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方法。

## 中央党校

培训五种类型的干部：

1. 省部级领导（7-10天的短期专门培训，或者3到6个月或1年的课程培训）；
2. 大城市和地级市的市长（4个半月）；
3. 特选的县委书记（4个半月）；
4. 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6个月、1年或2年）；
5. 提拔为副部级或同样级别前的中央级年轻干部（培训时间多样化）。

此外，还有专门为中央和西部省份的干部、国有企业干部、统战部门干部以及理论工作干部提供的特训班。

2001年7月，江泽民发表了“三个代表”讲话。自此之后，中央党校为企业家和商人们开办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和为期三周的非学位课程。对商业精英来说，中央党校的学习以及与党的联系是一种政治保护形式。

除了培训干部之外，中央党校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中国共产党改革政策的智囊团。

## 领导集体的更替

### 新生代领导人

在1992年和1997年召开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上，党政军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在中国共产党内，这个新的领导集体（“第三代”）体现出四个主要特征：

1. “技术官僚”的背景和视野；
2. 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经历；
3. 中央和省级党内机构工作；
4. 怀疑美国和西方。

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展现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与上海的关联。

在党的十六大（2002年10月）和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3年3月）上，无革命资历的领导集体再一次进行更替（人民解放军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更替）。严格的退休制度得到执行。“第四代”领导集体也展现出“技术官僚”的突出特征（比如工程专业和工业管理专业），但还具有其他七个特点：

1. 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一代；
2. 绝大多数具有在省级党务机关工作的经历；
3. 人们第一次看到拥有金融、经济和法律背景的领导人数正在增加；
4. 比前一代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年轻（平均年龄为55.4岁）；
5. 是中共历史上受到最好教育的一代领导集体；
6. 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
7. 十分缺乏国际事务经验，教育背景单一褊狭，没有海外学习经验，也没有国外旅行的经历，因此不会有任何强烈的国外倾向。

就胡锦涛而言，他的方式更多的是建立共识，逐渐地修改党的国家政策议程。他设法把领导集体团结起来，由此打造了一个基于问题而不是人事或派系的紧密团队。

李成认为，胡锦涛的绝妙之处在干，他提出了三项在党内外广受欢迎的政策议程：

1. 区域经济更加平衡发展；
2. 加强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关注；
3. 增强党和国家的透明度和制度化。

中共派系政治和强人政治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制度化的、基于共识和联盟性的精英政治。不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赢者通吃”和“一山不容二虎”的山头政治也不会很快消失。

## 五年来的胡温领导集体

胡温领导集体执政五年来似乎非常稳定。他们之间合作得非常好，从不侵入各自的官僚政治范围或政策范围。

在政策方面，也现了一些新的重点，不过“改革开放”的优先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更加偏向内陆的和平民化的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转变，但是，江泽民任期内开始的许多政策依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胡温领导集体没有放松对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其他潜在问题的严厉处置。

## 第八章：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存在吗？

### 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适：资产负债表

表 8.1 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因素：与中国比较

类别	因素	中国
经济	经济停滞	不存在
	消费贫乏	不存在
	军费超支，中央政府支出扭曲	不存在
	“第二经济”体系和黑市	不存在
	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隔绝	不存在
	缺乏外国直接投资（或作为变革因素的外国直接投资）	不存在
	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不存在
	不可兑换的货币	存在
	资不抵债的银行部门和债务积压（“三角债”）	存在/不存在
	落后的农业	不存在
	低效的中央计划	不存在

(续表)

类别	因素	中国
	执政党对计划过程的干预 不发达和幼稚的市场机制 价格扭曲 补贴和“软预算约束” 国家垄断对财产权利的侵蚀 中央和地方几乎没有共享的财政收入，但地方由于预算外收入而减少了对上级的依赖 不断增长的政府财政赤字 苏联的“新思维”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改革 由于新的地方干部既得利益集团和被赋权的公民，经济改革开始出现路径依赖 地方党政机构（还有军队）的新收入来源和随之增多的政府“寻租”行为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 存在/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政治	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具有变革倾向的改革派领导人 苏联的“公开性” 独立工会的形成（波兰） 改革精英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去合法化 官员腐败与执政党的特权 执政党执行党纪能力的下降 在地方党组织外出现的新政治精英 （各级）干部在新经济中获得既得利益 官僚机构缺乏回应性和效率 权贵的违法乱纪 尽管转向“技术官僚体制”，但干部和官僚越来越无能 基层党组织的衰败和消失 地方不服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命令和/或阳奉阴违 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下降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不存在 存在

(续表)

类别	因素	中国
社会	半独立或独立的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兴起 对工作场所和国家的疏离 腐败的蔓延 劳动力流动性和其他就业机会的增多 对公民的监督和监视的减少 （挫败的）国外旅行欲望以及与国外比较的能力 在企业中，政治忠诚与物质奖励的脱钩（“新传统”依附结构的衰落）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 零星的社会抗议、罢工和怠工 地方政府控制的法外“税收”、没收和收费 建立合法利益表达渠道的压力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文化	道德真空以及公众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不信任 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漠视和对历史的改写——寻找过去 日益不服从的媒体 全球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道德激励吸引力的下降 民族关系紧张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兴起 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认同（不同于社会主义认同） 宗教吸引力的增加	存在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强制	“党—军”关系的衰落——职业军队的兴起 议会和安全机构对执政党的不稳定的忠诚 强力机构的腐败 大众恐怖和胁迫策略的减少 人权关切的敏感性的增加	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存在 存在 存在
国际	“帝国的过度扩张”（苏联）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崩溃 东德和西德之间的“东方政策”  东欧国家日益独立（莫斯科）的外交政策 外部（苏联）强加的政党—国家 全球化	不存在 不适用 存在（大陆—台湾） 不适用 不适用 存在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考察的话，就会看到收缩与调适的混合证据。然而，如果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方面，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有理由断定收缩远远超过了调适。

## 预测未来

### 汉学家们的预测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中文名施乐伯）提出了四种看似合理的可能性：

1. 维持现状；
2. 通过政治-军事冲突或者以“进化”的方式分裂成几个国家；
3. 相对快速地形成一个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新国家，但这不必然会采取西方的道路，而是会效仿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
4. 威权主义-多元主义。

斯卡拉皮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实现“威权主义-多元主义的前景”，但他指出“这是一种灵活的、非永久的、实验性的秩序”。

鲍瑞嘉（Richard Baum）提出中国政治的七种前景，并为每一种前景设置了赔率：

1. 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6:1）；
2. 新保守主义（3:1）；
3. 新威权主义（4:1）；
4. 政治分裂——因为制度僵化（8:1）、地方分裂（15:1）与混乱（25:1）；
5. 军人干政（10:1）；
6. 民主化——要么产生于上层的革命（12:1），要么产生于底层的革命（20:1）；
7. 新毛泽东主义的复兴（50:1）。

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了中国政治变化的三种前景：

1. 政权自身内部将会产生出解决治理难题的创造性办法，从而带来组织和宪政的变革；
2. 地方的政治精英——而不是中央的政治精英——采取类似于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的渐进方式，先于其他地方进行政治组织改革的实验；
3. 政治危机或者党外某个社会群体的政治挑战。

魏昂德认为，最有可能的政治前景是香港模式的出现。

托尼·塞奇授提出了中国政治变化的六种前景：

1. 国家四分五裂；
2. 中央政权的崩溃，军队接管政权；
3. 政治制度崩溃；

4. 在政治制度崩溃后出现法西斯统治（军队支持的新威权主义精英）；
5. 在民主突破后出现“软威权主义”；
6. 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本质上是技术官僚政治，领导层尽力维持一种与经济逐渐自由化相结合的威权主义政治结构）。

塞奇排除了第1、2、3、5选项，认为第4选项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最终断定第6选项是最有可能的进程。

布鲁斯·迪克森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四种前景：

1. 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延续；
2. 不稳固的或非自由主义的民主；
3. 成功的民主化；
4. 军人政权。

迪克森估计了每一种前景的可能性，发现从2到4是最不可能的选项，尽管他认为3仍然有可能。

李成提出了2020年中国政治的三种前景：

1. 民主中国的诞生；
2. 长期的混乱无序状态；
3. 弹性的威权主义中国。

李成抱有乐观的看法，认为民主拥有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系中诞生的机会。

## 笔者的观点

一些预测实质上能够被排除掉——笔者深表怀疑的是：不论是作为精英监护的结果还是通过底层大众的要求，西方式的民主将会出现在中国。笔者也极度怀疑李成的预测，即党内的“两派合作”能够演变成竞争性派系之间的竞选。但这并不排除如下可能性：沿着新加坡模式或香港模式在**一党制**内形成竞争性的选民界别。

与某种民主形式的到来相比，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进一步发展与非党组织（例如全国政协）的广泛协商，或者赋予全国人大更大的权力。这就是鲍瑞嘉所说的“协商型列宁主义”。

另一个不大可能的前景是制度的崩溃——在这一点笔者并不赞同章家敦。尽管政党-国家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但是，制度崩溃和政权瓦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已经出现了**收缩**的状态，它的列宁主义控制手段不如过去那样锐利，但它的执政工具并没有锈蚀掉，相反正在重新焕发光芒。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笔者赞同黎安友对中国共产党“弹性威权主义”的描述）。

中国更不可能在全面的政治崩溃后四分五裂，因为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容忍或承认边远省份的独立。

长期的停滞状态既不是对当今中国的正确描述，也不是对未来中国的预测——在这一点上笔者不赞同裴敏欣。

中国也非常不可能堕入法西斯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我不赞同林震（Arthur Waldron）。

同样地，中国也不可能回到毛泽东主义制度。

如果我们有效地排除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些前景，那么中国政治的前景是什么？中国的政治将会走向何方？

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答案既不是“能”，也不是“不能”，而是既“能”又“不能”。

政权之所以会加速收缩乃至可能崩溃，执政党的停滞、僵化和对变化的漠视是根本的原因。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对“动态的稳定”和“静态的稳定”作出了有用的区分。所谓“静态的稳定”是这样一种状态：领导层要么吓得不敢作为，要么满足现状，因而不作出任何的调适。“静态的稳定”产生出稳定的幻相，但实际上是制度溃烂的反映。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前的苏联和当今朝鲜的状况。相反，“动态的稳定”认识到不断调适和改变的必要性，因而创造出另一种类型的稳定。

本书已经表明了1992年后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克服1989年后的停滞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调适能够拯救一个正在收缩的政权，为之提供无限的政治生命力。至少有四个方面会出现问题：

1. 零碎的调适性改革可能不足以应对困扰着整个体制的问题；
2. 调适性改革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而颠覆政党-国家；
3. 新的挑战是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像中国这样的新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无论具有怎样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都难以充分解决这些新的挑战；
4. 中国共产党会演变成某种新的混合型政党-国家。

倘若出现上述第四种可能性，那么在未来的10年或15年中，中国共产党可能需要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为了创造有限的政治竞争和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制衡，中国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方法：

1. 大大提高全国人大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和自主，从而形成体制内的某种制衡。其他一些向全国人大赋权的措施也是可行的。
2. 赋予八大“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力和自主。这使它们可以参与全国性的选举，大概会把全国政协并入全国人大（因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立法机构），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制衡。

竞争的措施之所以要增加，大概是因为需要提高责任性和透明度，改善治理和公共服务。这些变革的力量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差不多是政治发展的“规律”：当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时候，社会要求国家有效治理的压力就会增加。

当从发展中国家开始过渡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时候，执政党-国家实质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抑制或压制社会的要求，要么开放表达这些要求的渠道。胡锦涛时代（2002年-）似乎表现出采取第二种选择的迹象。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有限的开放是否会奏效，或者它是否会带来扩大公民赋权的要求。

恰如经济改革的经验一样，中国共产党最有可能实施渐进的政治改革：到处实验新的方法，然后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接受那些成功的实验，放弃其他失败的实验。在这种小心翼翼的渐进过程中，新的政党-国家正在形成：中国的“兼收并蓄型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将会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外国实践和本土实践，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政治体制。